

# 宰制與抗拒：

## 一所科技主導之大學校園所做的性別觀察

陳芬苓（元智大學社會學系）

張盈堃（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課程與教學系）

---

國內對於性別校園的討論少以大專院校為場域，本文所關切的主題為大專院校中的性別宰制與抗拒，並選擇一所以工學院起家、科技發展為主導的私立大學作為研究個案，以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進而與理論對話。比起其他教育場域來說，在以科技主導之校園做觀察，其性別化的脈絡或是文化的歸屬模式變得更為清晰，適切反映出性別化的學術科學特權與性別階層化的現象。藉由該校園的田野資料作為分析的文本，並輔以 Foucault 權力關係、文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教育學作為論述的視角，本文從主體、語言與互動、空間三個面向進行分析，在每一個分析單元中均包含權力的宰制與抗拒的討論，一方面探討科技為背景之大學校園性別化的建構過程及其宰制的機制，另一方面分析抗拒父權意識形態的可能性策略。最後，本文認為需要把女性主義或是批判教育學所揭櫫的精神落實在校園裡，以作為轉化學習經驗的現場。

**關鍵詞：**宰制／抗拒、權力、文化心理學、女性主義教育學  
收稿日期：93.10.18；定稿日期：94.5.23

我想提出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我們被壓制，而是為什麼我們如此急切、憤恨地反對我們的過去，反對我們的現在，反對我們的本身並以這種方式宣稱，我們被壓制 (Foucault, 1978: 16)。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解放的抗爭，必須脫離更大的抗爭以及作為更大抗爭的一部分，以致消除所有形式的宰制。我們必須了解到父權的宰制所傳遞有關種族主義以及團體受到壓迫其他形式的意識形態基礎，只要這些體系持續運作的話，那麼消除這些宰制的形式就毫無希望 (hooks, 1989: 22)。

## 一、前言：研究的關切

當今社會不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至今仍處處可見，不論在政治、法律、社會、文化、人身安全各方面皆是如此，並且性別之間的關係時常出現緊張對峙，甚至發生暴力相向的情況。究其原因，固然是以男性或異性戀為中心的父權文化所致，而教育體制也難辭其咎。從小我們經由不同的教育管道，不斷被灌輸、強化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以致造成今日性別偏見的結果，但長久以來本地的教育對這樣的事實卻很少加以反省。所謂「性別偏見」往往以某類屬（男性或異性戀）為準則作為評斷其他類屬（女性或酷兒）之依據，在不符事實的描述或主觀的判斷之餘，復伴著一種自行應驗的結果，造就性別偏見化的社會建構過程，而這正是文化心理學所亟欲處理的議題。然而由後結構

---

**致謝辭：**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4 年世新大學之「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本研究感謝元智大學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協助訪談工作之進行。

主義（例如 Foucault）的觀點來看待校園中的性別議題，權力的宰制與抗拒其實是並行的，學校雖然（再）生產父權的意識形態，它同時也可能產生抗拒父權的可能性，這樣的論點也類似於女性主義教育學所主張的論述。近年來，國內部份大學積極投入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如台大、清大、師大等都曾為其校園空間進行性別平等檢視，<sup>1</sup> 主要是呈現校園空間中的不平等，卻顯少論及學生抗拒性別宰制的主體性。

過去國內大部分相關的研究焦點擺在基層教育的場域，對於高等教育的討論相對較少。有別於基層教育中學生主要是資源的接受者，重視思考及批評的高等教育環境開始使學生具有反動的能力，因此大學校園中的性別議題其實呈現之面貌並不相同。正如同 M. Mayberry（1999）、K. L. Tonso（2001）選擇以美國理工學院中性別偏差為觀察對象，本研究選擇以工學院起家之校園進行觀察，不全然為了討論此類型校園中特殊的性別現象，而是因為性別議題在此脈絡中更居於弱勢，反而使得大學校園中性別化運作機制變得更清晰可見，進而突顯抗拒性別宰制之特質。例如：此校園中男性學生及教師數量都顯著高於女性，在此觀察到性別互動的不平等，要比在人文主導校園或綜合性大學中看到的性別互動的不平等來得更清晰。而男性顯著地主導學

---

1 「台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的活動計劃首創風氣之先，希望藉此喚醒台大師生對於校園空間中有關性別議題的重視，並瞭解到女性所經驗的環境意義以及女性在環境中的需要。校園性別空間體檢活動的基調，是從校園生活中最常接觸的空間著手，主要分為：運動空間、宿舍、廁所、校園安全幾個面向。透過校園參與，呈顯出「性別化」的空間現象下女性師生對校園空間使用經驗的陳述，以瞭解究竟是什麼支配了女性師生對歧視與危險的感知，以及如何改善這樣的現象，使女性師生在校園空間中獲得保障與尊重（畢恆達等，1999）。這樣的風氣也慢慢延伸到其他的學校，像是台灣師範大學與清華大學等。

校發展的決策，校園文化及空間資源是否只反映出男性觀點？傳統父權思維是否在此環境中特別容易被合理化？身為人數與權力邊陲的女性及少數性向者，是否有抗拒性別宰制的可能？本文並不想視此類型學校為特例，而是著重探討大專階段的校園性別問題與其他教育階段性別問題的本質是否有差異，哪些性別宰制是存在的？哪些性別宰制的本質不同？抗拒性別宰制的型態如何？

本文分析的個案在企業集團支持下成立於 1989 年，成立之初以工學院為主，此後又加入管理學院，爾後資訊學院獨立出來成為學校發展特色；之後為改制成一般大學才成立人文社會學院，但無論在師生數量或空間配置，甚至校務運作上仍然維持理工思維及性別盲目的現象（non-sexual phenomenon）。男性主導學校決策系統是很清楚的現象，目前學校行政體系中 16 位主管僅一位是女性（主管公共事務），學校重大決策多出自此，但學校亦受董事會監督，董事會中 15 位董事及 16 位諮議委員中亦僅一位女性。此外，二級行政組 20 位中有 7 位女性，學術單位 22 個系所主任中只有 4 位女性，學生社團 43 位指導老師中有只有 12 位女性，次級決策系統中還是以男性為主。<sup>2</sup>「標準化作業程序及效率」是理工思維的另一項特色，它是國內唯一一所取得教學行政品質 ISO9001 國際認證的大學，校園資訊化系統更是獨步國內，由於「e-life」及「綠色科技」為學校兩大發展方向，校園內所有溝通及行政都以網路進行，無紙社會使得訊息間的傳遞達到極具效率。

學生組成部份，工程學院人數眾多，3,535 人中女性只佔 15.70%，資訊學院 2,362 人女性佔 28.45%，管理學院 2,420 人女性

---

2 學校目前老師人數為 256 位，未有性別分析，其中有 3 位女性教授。

佔 52.69%，人文社會學院人數僅 1,002 人，女性佔 82.04%，女性約佔總學生人數之三成，性別數量上差距懸殊。由於系所發展以理工科系為主，社會科學方面僅有社會學系一個系所，學生接觸性別議題而得到啟發的來源有限，通識課程中長期以來與性別相關的課程只有「婚姻與家庭」、「現代西方女性主義與文學」及「兩性關係」。此外，性別人數的巨大差異，也造成校園中資源分配的扭曲。在一項該校學務處協助進行的兩性平等教育問卷調查中發現，大多數學生同意該校呈現男性特質，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以理工發展為導向、男女人數懸殊差異及建築風格等因素；在資源的分配（如宿舍數量、宿舍設備、校園徵才活動之求職工作項目、座椅的人體工學等）都偏向以男性學生之標準設計，在課程的安排（如通識課程及體育課內容）及運動場地的規畫上也常以使用人數眾多之男性需求為主，女學生明顯感受到校園資源分配之劣勢及限制；而男同學身處於陽剛氣氛濃厚，男老師眾多的環境，也感受到老師缺乏與其互動之熱忱（包括課堂互動及課後指導課業問題），及僵化性別刻板教育下的反動（陳芬苓，2004），其實校園中性別盲目或性別刻板化對兩個性別而言都是束縛。

因此，我們覺得這個有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分析，以探討大學校園中性別的宰制與抗拒。本文以該大學的田野資料為文本，做為與 Foucault 權力關係、文化心理學以及女性主義教育學等論述對話依據，一方面探討大學校園性別化的建構過程及其宰制的機制，另一方面分析與建構抗拒父權意識形態可能性的策略。本文田野資料來源主要針對該校 21 位學生進行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訪談進行時間為 93 年 1 至 3 月之間，以 2 至 3 位同時訪談之型態進行，以激發討論之深度，每場訪談約進行二小時。<sup>3</sup> 此外，佐以研究者問卷調查部分結果及觀察法輔助討論，<sup>4</sup> 以增加田野資料的豐富性。在本文的討論中

我們特別加重理論與田野資料對話的份量，期望能深化大學校園中的性別宰制的運作機制與其抵抗策略之討論。

## 二、文獻回顧：教育場域中的性別偏見

當前教育體制中是否存在性別平等的環境來提供男女性學生公平的教育資源呢？美國兩性教育學者 S. S. Klein（1985）曾以「雙刃劍」（two-edged sword）來形容性別偏見的教育，他認為在缺乏性別平等的教育結構與制度中，受教的男女性學生皆為受害者。這樣的論點當然也反應在國內外許多研究者在檢視當今學校的資源、環境、教科書、教材、教具與課堂互動時，皆發現其中充滿了性別刻板印象，如此偏頗的教材不但無法促進兩性平等，反而鞏固社會現存的偏頗印

- 3 受訪學生來自元智大學的四大學院，受訪者來自工學院有 6 位，資訊學院有 4 位，管理學院有 3 位，人文社會學院有 8 位；男生共 11 位，女生 10 位；1-4 年級平均分佈。訪談問題共 10 題，主要瞭解學生對校園中性別不平等現象(含生活起居、環境安全、教學環境及資源、課程安排與課程互動)、校園中性弱勢的看法，與抗拒校園中性別不平等的經驗等等。

接受面訪學生相關背景資料一覽表：

編號	性別	學科背景	編號	性別	學科背景	編號	性別	學科背景
01	男	工學院	08	女	資訊學院	15	女	管理學院
02	男	工學院	09	男	人社院	16	女	人社院
03	女	管理學院	10	男	人社院	17	女	人社院
04	女	工學院	11	女	資訊學院	18	女	人社院
05	男	管理學院	12	男	人社院	19	男	工學院
06	男	資訊學院	13	男	工學院	20	女	工學院
07	女	人社院	14	男	資訊學院	21	男	人社院

- 4 問卷調查以該校通識課程學生為抽樣母體，以班級隨機抽樣方式，限定不同學院及性別各 100 位的方式，共回收 676 份有效問卷。

象。如國內研究發現：教科書強調父權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扮演（江麗莉，1994；歐用生，1985；李元貞，1993）；強調男性的剛強與智勇，女性的柔順和嬌弱等特質（魏惠娟，1994）；男性多元化的職業形象，女性狹隘的工作角色（黃政傑，1988），可見教科書並非價值中立的產物。美國批判教育學者 M. Apple（2000）以主體意識和結構的關係來闡明教育絕非只是教科書、學生和教學的刻板形式，而是生活世界場域的另外一種形式，因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充滿矛盾、衝突、對立，故稱教科書的知識為「官方的知識」（official knowledge），一般人所學到的知識，只不過是那些組織過的、被認為應該教與應該學的資料，當然其中包括性別偏見所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知識。

本地學者潘慧玲（1998）與謝小苓（1995）曾指出教育過程中的性別偏差大致可以區分成「男尊女卑的人事結構」、「性別區隔的課程設計」、「性別迷思與歧視的教材」、「隱藏課程與師生互動」等四方面。然而，對性別偏差的探討不能只局限在表面的議題，更需要深入至結構面，特別是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學校作為社會制度之一，擔負著社會化的機制，因此，校園中的課程與結構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性別態度，並且更進一步的擴展到學生出社會後的行為處世。於是，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導因於教育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而校園中的性別不平等也再現了文化上的性別不平等。是故我們該如何看待校園中的性別議題？甯應斌與何春蕤（2000）從「教育就是性教育」以及「性教育就是教育」這兩個觀點來論證多元文化教育的論述應該連結性別教育的變革。文中藉由「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來顯示，有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文化意義、知識、實踐等，不但透過正式課程來傳遞，而且更是透過隱藏課程來傳遞甚至被內化

(internalized)。如同 B. Houston (1985: 363) 所言，性別歧視的問題可能不存在於正式的領域之中，但是卻繼續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產生影響力。換句話說，從隱藏課程所散發出來的影響力可能是不著痕跡的、隱蔽的、不自覺的。經由這種隱蔽的教育方式，許多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意義或知識得以被教導或甚至被內化，像是學生與學校威權結構（行政人員、教官、老師、班級幹部）的互動中學習到社會化的意義（Apple, 1990: 84-85）。因此檢視校園中的性別議題，必須同時結合正式課程與隱藏課程，批判教育學者結合二者稱之為發生作用的課程（curriculum in use）。

大學校園氛圍的差異性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如工學院背景的校園可能塑造出不同的性別區隔。Judy Wajcman (1991) 即批評科技學習對女性的排除現象；Tonso (2001: 156) 曾指出工學院中女性的處境，包括：（1）女性的比例居於少數，缺乏學習參照的對象。（2）比起男性而言，女性在工學院裡中挫的比例相當高，且有更程度的異化現象。（3）女性在工學院的職業生涯中，明顯感受到向下流動。J. S. McIlwee and J. G. Robinson (1992) 的研究中也指出：女性工程師在學習過程及職場上都承受非對等的權力。此外，Tonso 認為在工學院的校園中，性別化的歸屬文化模式（the cultural model of belonging）變得更清晰可見：「所謂的文化模式或是世界應該如何的運作的理念，是一種讓人們可以意識到的參考架構，並且人們會根據此參考架構討論意義與詮釋事件……當某個人行動喚起這個模式的相似面向，人們很喜歡去假定這個模式的其他面向也這樣被應用。」（Tonso, 2001: 157）她指出歸屬的文化模式由兩個連鎖的意識形態所組成：學術科學的特權（academic-science prestige）與性別的地位（gender status）。據此，不難理解在父權為主導的文化中，男性往往

佔據著學術科學的優勢地位，因此文化歸屬的類型經常是性別化的。當然這種性別化的文化歸屬類型也不只局限於工學院的場域，過去亦有許多研究關注女性進入男性為主的職場，或者就讀男學生為主的科系（如建築等），例如國內外研究發現建築系的女生遭遇視而不見、蔑視與聚光燈效應等三種特質（畢恆達，1994），這正是很典型文化歸屬類型下的效應。學者也發現國內科技型大學的系所結構也會影響學生接收到性別批判資訊的機會，它們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與性別有關之課程數量較少及偏向傳統觀念的課程，可能與校內缺乏相關師資有關，也會影響到學生在大學生涯中接觸到「性別」概念的機遇（陳芬苓，2003）。

性別教育學者 Klein（1985）曾說：學校的教室即是社會的縮影，教師會因教學的互動而將社會中期許男女學生應有的思考、行為、價值觀傳遞給學生，因此要如何規劃一個無性別偏見的教育環境顯得相當重要。何春蕤（1998: 23）曾提到，我們的教育其實一直在做性別刻板角色定位及以性道德要求大家各守其份的「性別教育」，而成長於這樣教育體制下的老師們，一時間可能很難長出「具有性別意識的眼睛」，來看到性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她倡導「性別解嚴」的重要性，認為在今日政治解嚴與政治佈局的大幅度變動下，許多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育措施應開始遭到質疑，也就是政治解嚴後還需要進一步的性別解嚴。而性別解嚴的起點要從性別角色的多樣化開始，過去那些原本在性別體制中受到孤立打壓的性別異議份子應得到同儕及老師同等發展之尊重。性別解嚴不需要用什麼標準的榜樣與模式，所需要的只是空間與自由。至於該如何性別解嚴，首先要從文化與權力的角度切入。

### 三、看問題的角度：文化心理學、權力關係與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視角

對性別議題探討的切入點很多，本文認為可以從文化以及權力的角度著手。首先，文化提供了一套工具箱，讓我們得以藉此來建構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對於自己和對於我們的力量何在之種種觀念。因此在鉅觀層次，文化視為一套包含各種價值、權利、交換、義務、機會和權利的系統；在微觀層次，文化系統影響了那些必須在其中運作的人。用文化的角度來思考，為什麼扭轉性別偏見是如此地困難？就像文化心理學者 J. Shotter (1989) 表示：我們很習慣以一套理論來理解日常生活的全貌，並不自覺地讓我們的行為中存在一指導方針而能簡單地被說出來；因此我們常不自覺地把我們的經驗形式化，並將經驗與宰制內在的社會秩序作合理的解釋。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個人所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乃是一種意欲的世界 (intentional world)，人類不斷在其生存的意欲世界裡尋求意義與資源，而此意欲世界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排列、結構與運作，也是供應意義與資源的目的。

R. A. Shweder (1990) 認為文化心理學首要關心的問題是：人到底如何解釋他的意欲世界？其內容為何？在意欲世界裡，沒有任何的事物是真正就是那樣或這樣 (real just is)，不同的意欲世界可能賦予相同東西有著不同的意義。人若賦予事物意義，該事物因而有意義；人若不賦予事物意義，或不對它作反應，對人而言它將不具有意義，也不是有意欲的。由於不同的意欲世界對相同事物會有不同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型式，所以橫跨不同時間與空間向度的意欲世界對事物的認同不會是天生的，也不具有普遍性。但是 Shweder 認為人具

有異質與分化的基模，某些事物會因文化的學習而消失／抑制或增強。文化心理學強調人類共同而普遍的心理活動或心理功能的存在，如感覺或感受的心理經驗，是受到文化約制的、界定的，性別化或是性別偏見的形成也是依循類似的方式建構的。

此外，文化心理學也主張人與社會環境、主體與客體是相互依賴的，每個人的主體與心理活動都是透過其對文化意義的掌握過程而發生改變。因此每個文化成員享有共同的習俗、意義與語言，不同文化成員對其主觀的圖像都不相同，而其主觀建構的世界也就有所差異，但對此文化成員自身而言皆是客觀實在的世界。總而言之，文化心理學強調文化框架與心理間相互建構、辨證的、動態的關係，人不只是參與其所在生活的文化習俗中，人同時也被拘束或局限在其心理所重新建構這些活動的形式中，這些文化框架構成了多元客觀的世界本體 (Shweder, 1990)。這樣的論點極似 P. Berger 與 T. Luckmann (1966) 的著作《社會實體的建構》一書中即指出：社會同時是一個客觀與主觀的實體，而社會實體不僅是某種「就在那裡」的事物，也是經由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意義建構而生產或再生產的情況。因此，文化心理學關切的是意義的生成與協調、符號技能 (symbolic skills) 的習得，尤其是關於所有心理活動之文化置身性 (situatedness) 等等 (宋文里, 2001: 19)。文化心理學對教育的主張即是：「學校文化上的立場不可能是中立的。學校教些什麼，對學生栽培些什麼思維模式、什麼言說載錄的方式，都和學校置身在文化脈絡中的方式不可分割。因為一所學校的課程並不只是關切教材而已，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學校最主要的教材乃是學校的本身。」(宋文里, 2001: 57-58)

除了文化心理學的觀點之外，我們認為同時也需要以權力關係的角度來分析校園中的性別議題，像是 M. Foucault 從文化與日常生活

層面的「主體屈從」<sup>5</sup> (subjugation) 觀念來解釋性別偏見與性別化一樣。這種權力延伸在日常生活中，對個體分類，以致造成個人的認同，強加真理的法則，個人及他人因此而有所認識。主體屈從必須涉及身體政治技術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 的分析，這種政治技術通常經由細密的知識規劃、組織，並以具體的技術方式設計，排除高壓的手段，並且主體能依照一種物理秩序，進入愈趨規範化的當代社會之中 (Foucault, 1988a: 145-146)。故受到壓迫的來源除了外在壓迫性的宰制之外，也同時包括不同知識模式、社會分類、自我設定等內化的形構。因此，我們必須檢視性別化的知識如何滲透生活實踐，表現在校園的制度作息、政策立法、語言分類、常識儀式等對身體行動規範化的各種網絡之中。

此外，在談論校園中性別議題時，另一個重要的概念是「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這個概念所關注的是各種規訓的力量如何作用在身體上，而身體是各種權力衝突的場所。在 Foucault 的研究中，其展示的規訓技術主要在兩方面，一個是權力的技術 (technology of power)，運作在空間的分配、活動的編碼、時間的累積、力量的控制等面向，使身體處於最有用的狀態；另外一個是自我的技術 (technology of self)，由界定自己的本質、選定方法、不斷地操作與目的及環境間的配合等面向，具體表現於對自我的關懷，對自我不斷檢查、反省、告解及對自我的知識的探詢等行為上 (Foucault, 1988b: 18-49)。Foucault 認為文化對身體的權力關係是無所不在的、由下而上，而且是有意圖的。人們通常是在一種不自覺的情況下內化這種意

---

5 在 Foucault 的脈絡下，主體有兩個意思：「透過控制及依賴而屈從於別人，和透過良知與自我認識而與自己的身分相連結。這兩種意涵都意味著一種使個人屈從及隸屬的權力形式。」(Foucault, 1983: 212)

識形態的價值觀，並且自願對其奉行不渝，所以說它是一種最持久而最具彈性化的社會控制。對於權力的分析方法而言，Foucault (1978: 94) 強調「權力來自底層」(power comes from below)，這涉及三個重要的面向：第一，權力關係中常以中心／邊陲、統治者／被統治者，甚至權力主體／權力客體等等二分眼光看待權力現象。第二，權力無所不在，權力關係無所謂中心，各個權力／抗拒在特定時空的知識條件下分別得到落實或強化。第三，權力的運作並非簡單的上令下從的關係，居於底層者也並非總是以被動承命的形象出現。在權力關係相互性中，無論權力的宰制或抗拒都在權力關係中佔據著重要位置。

最後，我們認為文化心理學所指出的社會建構與 Foucault 強調的權力關係，二者與女性主義教育學 (feminist pedagogy)<sup>6</sup> 有著選擇性的親合關係。C. Sherwsbruy (1987: 7) 定義女性主義教育學為「將學習者賦予權能成為一個表現負責，且將學習的結果付諸實踐的社會行動者」，女性主義教學主要對傳統教師權威性角色與知識論提出挑戰，它強調個體的經驗、感覺的主觀知識建構與差異性，而其目

---

6 潘慧玲 (1999) 歸納出三種女性主義教育學的模式：(1) 性別模式：此種模式從個人心理層面出發，認為女性具有和男性不同的特質，而女性看待權力的方式與男性不同，女性是分享權力而非行使權利。所以此模式重視思考歷程的主觀根源，重視個人經驗、情緒、價值與所知的關連，並挑戰現今主流形式的概化、抽象、理性的知識。(2) 結構模式：此種模式探討教育系統如何複製現有不公平的制度。關心的是社會結構、結構對學習產生的影響以及知識生產的政治；重在檢視控制知識生產歷程，以及婦女等被邊緣化的政治與社會機制。(3) 結構女性主義教育學模式：此種模式重視性別與其他壓制系統的交錯作用 (intersection)，這種交錯作用對於自我的建構具有關鍵性影響，而位置 (positionality) 乃是首要關切的議題。從文化心理學與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看，本文所謂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偏向結構女性主義教育學模式。

標乃是培養女性主義政治技能，並能提供另類的教育經驗和異於傳統教育觀點的詮釋。因此，女性主義教育學某種程度上觸及意識形態和理性主、客觀知識形成的問題，針對女性長期的性別不平等、偏見、歧視與區隔的經驗，提出相關的教育改革立論，以冀達成個人發展與性別和諧社會的實現。在女性主義教室中，重視學生的經驗知識，學習尊重彼此的分享與質疑，由對談甚至激辯中讓教室中的每一成員都能因而自覺、自省並發展自我。女性主義教育學認為學生本身的敘述經驗即是知識建構的主體，所以師生的關係是非階層化的。對女性主義陣營來說，挑戰主流的教育價值觀和教學實踐，和朝向轉化的學習情境一直是女性主義教育學所關切的焦點，並且視校園為抗爭與挑戰的地點。事實上，女性主義陣營所關注的議題並不是快速地找到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而是先著重於問題陳顯的意涵，打破以往教學理論真空情境與黑箱作業式的知識產生，進而以扎根於教學現場之經驗反思來建構知識（楊幸真，2003）。

在進入文本分析之前，我們應該先問到：為什麼學校的校園呈現性別化的現象？其中的關鍵因素環繞在 Gillian Rose 所謂的「男性氣概的理性」（masculinist rationality），或是 Robert Connell 所謂的「霸權的男性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其中，Rose（1993: 6-7）認為：「男子氣概的理性是一種知識的形式，假定認知者相信他能夠分離他自己的身體、情緒、價值、過去等等，以致他的思想是自動、無脈絡與客觀的，以為這種對客觀未受到特定社會位置所箝制，並宣稱這種理性為普世的」，這也是女性主義教育學陣營所挑戰的領域。男子氣概的理性或是霸權的男性氣概具有正當性，彷彿是一種日用而不自知的常識（doxa），這樣的常識往往對於性別秩序的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校園中究竟呈現出何種程度男子氣概的理性？女性主

義教育學的理念有多少落實的空間？Foucault 的論點提供了本文分析的基石，文化心理學的論點反映校園中性別脈絡之本質，而女性主義教育學對學校結構的反動引導了未來策略的方向。

#### 四、性別化與去性別化：主體、語言與互動、空間

到底我們要如何細緻地檢視校園中父權意識形態的建構？Foucault（1980:127）認為對於權力關係的討論，其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誰擁有權力，而是要問權力如何行使，這是因為權力只有在行使的時候才存在的，而權力關係就是用行動去影響、組織、建構他人行動的可能性。所以說，權力藉由文化進入到行動者的知識庫，同時受到社會權力的約制，因此個體行動的主觀意義並非先驗性的存在，反而是社會建構。因此，權力應當理解為一種多面向關係，它是經濟活動、知識傳播、意識形態關係中不平等與失去平衡的結果。就像先前所提到對於權力的論述，Foucault 強調權力分析不應僅從壓迫層面來瞭解，而應著重於日常生活抗爭（everyday life struggle）的層次，也就是應從草根性的層面來研究權力，因為權力與抗拒是同時存在的。

然而何為抗拒？批判教育學者 H. A. Giroux（1983a: 260）定義抗拒為：「抗拒理論最重要的假定是勞動階級的學生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唯唯諾諾地屈服權威的教師與學校的命令，預備他們成為失去活動勞工的生活。相反地，學校再現了一個挑戰的領域，不僅是在結構與意識形態的矛盾，也受到集體學生的抵抗。」故抗拒被定義為：「抗拒行動的本質與意義必須被定義到發展 Marcuse 所謂在所有主體與客體的領域中，對感官、想像與理性解放承諾之可能性的層次（Giroux, 1983b: 108）」。因此，抗拒的潛力我們認為一方面來自結構

的抗力（structural leverage），另一方面來自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教育學所談論的抗拒是放在抗拒的實踐層面，視之為一種對立的行動，但我們同時需注意到抗拒的論述層面。本文擬從主體、語言與互動、空間三個面向進行檢視，性別「主體」的形成談的是受訪者自身性別認同過程，「語言與互動」的面向呈現的是校園中性別的符碼與性／別間的行為，而「空間」面向談日常校園生活的經驗中外在環境對不同性別的限制及硬體資源分配之性別差異，亦即由內而外——自我、人際互動到外在環境——主體、中介與社會空間關係等分析層次，於每個面向的討論中同時呈現權力宰制與抗拒的分析。<sup>7</sup>

### （一）性別化的主體與去性別化的主體

對 Foucault 而言，性別意識並非天生自然，而是後天建構的。當一個情慾主體在不同的時空中面對各種性論述／知識，以及當時社會權力結構所期盼的性常態（sexual norm）時，性意識於焉產生。性意識可以說是多種力道、因素較勁的混合產物，因人、地、時而異／易。大學校園身為教育的下游場所，自然承受過去刻板性別化教育的累積，我們田野中的受訪者一再提到的性別刻板印象，就是一種後天建構下的性別論述與知識：

給我的感覺是老師都覺得男生比較可靠，比較會做事，力氣比較大……而把低技術層面的工作，像祕書、助教、助理等，就

---

7 對於本文三個面向結合度的闡述，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建議。

說女生比較在行，女生記憶力好，然後又細心，基本上已經把一個整個社會的面向衍生到大學。（受訪者 17，女）

男生在學校打工機會比較少，他們都喜歡女生，女生比較細心、聽話……為什麼搬器材的苦差事都叫男生做？（受訪者 21，男）

我們認為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就是刻意根植於社會性別下，努力地要劃出所謂正當的社會秩序。而父權意識形態與異性戀為中心的校園正巧妙地運用這樣的界線，建構神聖與世俗的區別。然而在科技發展為主的校園中所呈現出的性別脈絡，混合著學科優越與性別階層化的概念，除了男／女的優／弱勢的區別外，更有科技／人文、男／女、優勢／弱勢、理性／非理性、異性戀／非異性戀這些另外一層性別階層化的存在：

談到性別議題，由於是工學院起家，男生比較多，不管是球場、廁所、圖書館資源，都是男生用的比較多，女同學在學校還是弱勢吧！……校園中男生多到看起來噁心的地步，妳一直走路走了十分鐘路上看不到一個女生。（受訪者 18，女）

因為學校本身就是以工學院為主改制的學校，人數就是男生佔優勢，而且是佔極大優勢。我覺得學校裡面的人文素養非常不夠，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就是那種相處的感覺……我只能說：就是工學院吧！（受訪者 12，男）

現在慢慢的念理工的女生越來越多了，就我認識的的女生啦，其實她們覺得唸文組的女生滿笨的。他們覺得在理科的訓練下思考會比較有邏輯性，處理事情的態度會變的跟以前不一樣，就是比較有邏輯，一步一步的。（受訪者 2，男）

學校宿舍頻寬一進來的時候是女生比男生快，可是有時候男生常常是抱怨啦，說女生用電腦搞不好需要的功能沒那麼多，幹嘛那麼快阿，我們男生就是還需要弄什麼連線，玩遊戲這樣之類的，真正需要快的宿網。（受訪者 13，男）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工學院的男性在這個校園中擁有較多的象徵權力呢？我們認為象徵權力必須立基於某種象徵資本的擁有之上，而象徵資本像是一種文化優勢下的權力，這種權力授與某一些位置上的人，放在這所以理工為主導的校園中，視工學院的男性為這所學校的代表，也就是代理人的問題；就像 P. Bourdieu（1989）提到代理人如何能夠被賦予以群體之名來行動與發言的完整權力，而這個群體藉由他／她的口號、標語和命令的神奇力量作為集體的體現。當學校把工學院當作為主導的同時，體現的是一種學科與性別的階層之下的權力關係，與權力運作下的迷思。

此外，Foucault 認為身體規訓與紀律常藉由儀式、制服、<sup>8</sup> 姿勢規定、空間與人員的配置、控制作息的時間表、考試、個案的文件紀

---

8 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到在制服上的不合作，「我是覺得上課的時候很熱，假如說台上的老師不是男生的話，有時候男生也會，就開始搨啊搨啊，用裙子搨，不然就是把裙子脫下來裡面穿一個小短褲啊。」（受訪者 17，女），這是一種很典型的抵抗方式。

錄管理、學生自治等，使得學生的身體聽話、柔順。在工學院為主的學習環境例子中，往往呈現的是過度保護女性現象，而這種保護也成了某種程度的能力限制與身體規訓

女生假如程式不會寫，學長就會幫忙寫，不然就是女生要做什麼事的時候，如 po 版的時候，一定會有學長去幫忙……反正女生很少，我們會特別關心。（受訪者 14，男）

遠紡宿舍本來規劃是要給女生住，可是後來家長會就很鬧，說遠紡有外勞，過馬路女生又危險，又在校外，這樣很不好；所以學校就決定一部份男生就要搬到遠紡去，其實這是可以看出整個社會或是說刻板印象就是覺得女生的安全比較重要，女性的身體比較需要重視的，而不重視男生的安全。（受訪者 19，男）

談到兩性平等這種東西，我是覺得說這種東西實行的機會也蠻低的，如果實際一點，我是覺得像照顧到女性的安全。（受訪者 13，男）

不過，規訓並不是單方向的全面宰制，總會遭遇到抵抗、挪用或是協商，這是一種打破把性與真理連結在一起的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Foucault 稱此為倒轉論述（reverse discourse），即一種借力使力的反擊（Foucault, 1978: 56, 101）。換句話說，權力的迴路（power circuit）是無所不在，而鬆動規訓的地帶也同時存在（Foucault, 1977: 93）。就像 Foucault 認為權力是流動的、多元的策略運用，因為權力的運作在各個主體間的縫隙中流竄，因此，雖然權力

具有規訓的一面，但是在權力的縫隙當中，個別主體游擊隊般的另類翻轉行動（modes of guerrilla subversion of patriarchal codes）所蘊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也是相當地重要。這樣的行動往往是不可見的，因此要看到抗拒父權的可能性必須從隱藏的檔案（hidden transcript）<sup>9</sup>裡探究。然而大學重視思考及批評的訓練，也會使學生自發性地反思過去傳統性別教育的偏誤，提供了重建其性別主體性的機會。

我覺得大學中的男生應該上護理課，他們也需要對急救包紮有認識，緊急狀況時才能自救救人，一些生理上的常識男生也很需要吧，不要說生病女生要去照顧他呀……我也很想上軍訓課……。（受訪者 20，女）

男生宿舍的浴室也應該像女生宿舍一樣用毛玻璃，我們男生也是要有隱私權，不是男生的身體就可以很公開的。（受訪者 12，男）

為什麼餐廳老闆都會給男生比較多的食物，他們假設女生一定吃得比男生少嗎？（受訪者 7，女）

而男性學生也更勇於去挑戰長久以來在校園中對性議題的禁忌。

---

9 這個概念來自 Scott 對農民運動的分析，Scott (1990)提到農民運動為了達到成功與顧慮安全的考量，因此以一種喬裝的抗拒手法來進行，而這種喬裝的抗拒手法表面上是避免公開地與權威結構產生衝突，而終究也可以達到抗拒的目的，從屬團體往往也會隱藏其活動與意見，故意不呈現在官方檔案（official transcript）紀錄裡面，因此他建議我們需要從隱藏檔案裡面著手，例如大學校園常見的 BBS 站，基於匿名的安全性表達也可視為隱藏檔案。

護理課應該成為必修課，包括介紹性行為的知識，既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就是私下講跟公開講之別，其實我是覺得不管有沒有經驗，這是應該要知道的事情，課堂上不講這個的話，然後我們對這個知識又不瞭解，到時候發生問題的時候，是誰要負責。（受訪者 13，男）

前一陣子 X X 系他們在紅磚道，就是學校路口那個下坡道，連署說要在學校裡面設保險套的販賣機。（受訪者 14，男）

對女性主義陣營來說，挑戰主流的教育價值觀和教學實踐，並朝向轉化的學習情境一直是女性主義教育學所關切的焦點。我們主張校園可以作為一種「學習社群」，讓校園中的成員都能質疑及對談，體察到文化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結構性的宰制關係，如此才能夠達到去性別化的主體的目的。在該校進行的調查研究也發現，高中純男校畢業者對於傳統男女有別的刻板印象最深，但反映出抗拒性別主體性的態度也最強，他們反對校園安全應以保護女生為主的作法，最贊成男生也要上護理課。反觀高中純女校畢業者具有最平等的性別角色態度，進入以科技主導的大學所感受到資源分配不公平及老師課堂上開黃腔所造成主體感的傷害也最強（陳芬苓，2004）。由此也可回應女性主義教育學的主張：女性獨立的教育場域對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有長遠正向的影響（Maher & Tetreault, 1994），但對男性而言卻恰好有長遠負面的效果。

## (二) 性別化的語言與互動與去性別化的語言與互動

在性別化的校園裡面，對性別偏見典型的做法是隱藏與消音，其意味著學習不要去注意與言說。從我們的訪談中可以發現有趣的現象，為什麼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往往無法加以言說呢？為什麼校園中存在著一種習慣性的沉默文化呢？首先，S. Tyler (1978: 5-6) 指出言說包括語言與書寫，這是一種內在知識形式的外在表現，再現了慣常使用的符碼與規則之無意識知識。語言常是社會團體的現象，而非個體心理的反射；一個人能夠說著相同的語言是因為有著共同的音韻、文法與語意，即語言反應著內在的知識庫 (stock of knowledge)。語言也是一個先驗及慣常的形式，說著某種語言隱含著一個人必須與其所屬團體在相同的方式之上運作。此外，Tyler (1978: 459) 指出說的行動 (the act of saying) 包括言說、閱讀及寫作，也就是一種已說與未說 (the said and unsaid) 的象徵統合體。

Foucault 指出語言並非只是現象實體的反映與呈現，或者作為客觀的溝通工具而已，語言的使用事實上即界定了它所指涉的現象之特定屬性 (Foucault, 1972)。因此，在日常生活語言的運用中，也包含了不少象徵性權力運作，如性別相關的論述可能被特定的社會階層所佔據，由他們去生產和詮釋訊息。故凡對語言掌握的人，就是具有潛在的權力優勢。此外，日常生活互動中，消音 (silencing) 常作為限制他人參與言說論述之權力關係運作的方式。例如在學校中對同性戀這個語詞往往是無法具有正當性的位置，一旦有人提到這樣的字眼，就用：「不許說，你不可能會知道」來下禁制語令 (Sedgwick, 1993: 53)，或是不以同性戀之命名言說 (張喬婷, 1999: 90)。換句話說，消音或是失語在某個程度也反應出內在的恐懼。

在以科技主導的陽剛大學校園中，對於性弱勢議題的消音現象仍然存在。在我們的田野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對受到壓迫的性弱勢者均能以政治正確的語言來加以表達，但是更進一步追問時，多半對同志與娘娘腔議題的言說或言詞以閃爍的方式表達：

基本上我尊重他們[同性戀]……但在我心裡的某處還是覺得這樣子好像怪怪的，因為即使在同性戀裡面，其實他們還是不少有分零號跟一號……好像同性戀還是有分男女這樣子，我覺得說還怪怪的。（受訪者 6，男）

他曾經向我說過他是雙性戀，然後就希望可以跟我做好朋友這樣子。……我就有點嚇到，因為我沒有這樣子的心理準備……就跟他開玩笑說：「你是不是在騙我阿？」然後我會有點正經的跟他說：「目前我沒有這方面的需求，可能我的思想比較傳統，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同性戀。」我不是說我很排斥同性戀，可是我本身沒有辦法接受。（受訪者 5，男）

我覺得娘娘腔跟同志都是我們的刻板印象，只是一個大家冠上去名字，可是談戀愛就談戀愛，感情就感情，並不會因為說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我覺得這很正常。只是覺得他很可憐，上帝把他造成男的，然後他喜歡上一個男的，然後就被歸類為同志，其實這只是自己心態的部分，你喜歡的那個人在性別上不同，可是如果不考慮性別，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受訪者 12，男）

但沉默與冷淡大概是一種政治正確性的反應，受訪者也認為很難單靠個人的行為去改變結構上的問題，在這個以男性佔大多數的校園裡面，對於恐同症的心態格外地明顯，抗拒的勢力也異常微弱。許多校園都有支持同性戀或討論女性主義的學生社團，但在該校園中並沒有，反而是有為數眾多代表陽剛性的體育性社團（佔近三分之一的社團數）：

我有聽過類似的經歷，像我在 x 大有一個同學，他的一個男生同學很 sissy，也是 gay，受到很多的排擠，尤其在很保守的師範體系。可是我同學也是無能為力，因為他在跟排擠那位同學的人說，結果他們的反應是，妳幹嘛跟他一樣啊，本來你要去解釋也受到排擠，這是一個以大欺小的感覺。（受訪者 17，女）

大體上來講是應該不會[反駁]，反正我不是很清楚他們在講什麼，我覺得那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我會覺得這種事情就算你去跟他們講也沒有用。（受訪者 3，女）

校園中的儀式行為或是互動的姿勢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同儕的儀式是由參與者所參與、經驗與解釋的重要組成事件，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儀式被視為神聖的活動，創造了個人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校園中的阿魯巴（Aluba），這是一種透過雄性暴力的方式所展現的陽性同儕認同：

阿魯巴就是要踐踏那個男的生殖器官。（受訪者 10，男）

阿魯巴……怎麼說呢……就是那個氣氛吧，就是男生被大家折磨，其實大家也不會真的去弄痛他啦！就是感覺有一點好玩、好笑。……我知道這本質上是暴力，而且侵犯人家權力的行為。（受訪者 5，男）

阿魯巴是一種取得認同的手段，就是當你可以阿魯巴別人的時候，別人為什麼不能阿魯巴你呢？那如果你不想被別人阿魯巴，那可能下次你可能生日的時候，就不會有人鬧你，但是可能就會慢慢少掉這群朋友，就是大家互相溝通嘛，這是一種符號，我認同這個符號，大家就會有共識，就會有交集在一起，我覺得那是青少年之間認同的一個符號……人緣好阿（別人才會想阿魯巴你），所以這是個符號嘛，就是表示說你還有朋友，那時候會這樣想。（受訪者 14，男）

相似地，在 Mairtin Mac an Ghaill（1991）的田野中指出學校的正式課程與隱藏課程就像是一個性別的篩檢器，每個男孩都有「證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男人」的需要，所謂真正的男人意指著異性戀的性取向，因此所有的男孩聚在一起，表現出強壯的舉動來證明這是個男人的場域。若再結合 G. Rubin（1992）的性階層（sexual hierarchy），與 Bourdieu 與 Willis 等人所提出的「文化再生產理論」，那麼校園上種種文化與次文化串起來，某個程度上也是一個「性階層再生產的場所」（site of reproduction of sexual hierarchy）（Bourdieu, 2001; Willis, 2000）。在此，男性與女性、性強勢（異性戀）與性弱勢（同志、娘娘腔等）就形成上下階層的關係。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對娘娘腔與男人婆有著不同的評價標準，多半較能接受男人婆的形象，而

對娘娘腔的男性持有負面的意見，尤其是男性。其現象符合 T. Gorely、R. Holroyd 與 D. Kirk (2003) 的研究：

其實我比較不能接受娘娘腔，一個大男人身強體壯，那麼粗獷，你講話的方式比較女性化，比較柔性的話，人家會覺得很噁心。（受訪者 9，男）

通常個性比較娘的話，在男生班裡面可能都是被孤立的，因為有的男生不習慣看到別的男生這樣娘娘腔。（受訪者 5，男）

我是覺得他做事很扭扭捏捏，一些行為舉止，看起來很像古代的女人。就是不管做什麼小拇指都會翹起來，然後他都會打人呀，他會捶人家，就是這樣我覺得很噁心就是了。（受訪者 1，男）

在校園父權式的監控下，自然造成男性學生間身體接觸的隱形禁忌，不像女性同性間被接受可以以牽手勾臂的方式表達親密；男性同學間的友誼是不容許以肢體表達，校園中男性間的親密常以暴力（如阿魯巴）的形式呈現，我們的受訪者也提到對於男性友誼禁忌的抗拒心態。

我們男生都會為比較好的朋友取小名或代號，這些小名都很可愛，普通的朋友間不會這樣做，所以取小名代表我把你當朋友，不像女性會取代號的對象常是她討厭的人。（受訪者 21，男）

因此，學校的結構體現了父權意識形態下所建構出來的性別差異與性別階層化，如男尊女卑、異性戀高尚，同性戀低俗等等，也就是中心與邊陲或半邊陲的關係。不過這樣的差異與性別階層也不是絕對地穩固，在該大學工學院的次文化中，有一個叫做「工院皇后」的選拔就是一個兼具再生產性別化與抵抗性別化的有趣例子，也就是典型 M. Bakhtin (1984) 所謂詭態 (grotesque) 的展現。工院皇后主要透過男性易服的方式所進行的一項選美活動：

基本上工院皇后的選美第一步是主持人訪問，再來就是才藝表演，包括手語、唱歌、畫劇、跆拳道、吹 saxophone、拉小提琴之類的，然後還有一些趣味活動，如人妖打排球，男生穿女裝、跳繩，凌波舞啊來製造一些笑料。參與的男同學會跟女生借胸罩、化妝品……然後看你要選什麼主題，像是豹女郎、學生妹、檳榔西施、熱褲，通常是找一些系上比較會打扮的女生借服裝。當然這些有點是 A 片形象的投射，我不否認工學院男生最直接跟女生接觸的部份就是 A 片，很直接就連接在一起。工院皇后一開始真的很認真讓男生去扮一個很漂亮、唯美的女生……大部份的「娘胚」都會被推出來參加選拔，我覺得娘胚就是一個 freak，講難聽一點就是畸形，大家很喜歡看不同於自己的人，以致增加自己的認同感，看了之後就覺得自己好 man 喔！……活動中非常強調第二性徵，聲音、舉止等等，我覺得滿噁心的……。（受訪者 13，男）

就性別化的層面，表示大家喜歡看到不同於自己的人以增加自己性別上的認同，這樣的看法正好應證 R. W. Connell (1987: 83) 認為

男性透過社會實踐來獲得男子氣概，而這樣的社會實踐是基於對他者身體的意義。但在去性別化的意義上，易服的儀式反而鬆動了性別意識形態的疆界與界線。

不過，我覺得工院皇后帶來很多衝擊，我跟幾個參加過工院皇后的人聊過天，他們覺得其實這是個很值得回憶的東西，而且經過工院皇后之後，他們在穿著上會比較中性，對衣著的接受度會大很多，不會排斥一些刻板的東西。（受訪者19，男）

如果工院皇后叫女生去扮，一點意義都沒有，但是男生來扮的話，第一個趣味性高、可看性也比較高，當然也有性別界線的跨越。因為我覺得裡面還是有比較正面的部份，像是男生反串也要才藝表演啊，只是動作會比較誇張一點，我覺得那是男生也跨到女生那個領域，對學校打破性別區分是有幫助的。（受訪者7，女）

### （三）性別化的空間與去性別化的空間

空間的設計可以視為一種論述，這是在既定的校園場域中，一套建構設計領域的知識與實踐，即設計的體制規訓、模塑與連結了表徵與社會實踐的體系。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早已指出建築這個場域長久以來是男性所主導的，如 J. Gero（1985）。在這樣思維下的建築物與空間，往往缺乏性別與身體的考量。換句話說，建築物或是校園空間背後的隱藏課程，呈現出父權意識形態所賦予的價值、規範與態度。因此，具有女性主義或是性別思維的空間設計者開始在權力與差異之間

進行協商，檢視女性在社會、空間的劣勢處境。為何需要把空間的向度獨立於主體與語言呢？M. Castells（1977: 115）認為「空間是一物質產物，與包括人在內的其他物質元素有所關連，而人自身進入了特定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賦予空間形式、功能和社會意義。」Castells（1992）進一步強調：「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表現，但社會過程也影響了空間」，因此，空間是一種社會關係。

大抵而言，學校空間的建構呈現男性的思維，因此不只是形塑所欲之霸權的男性氣概，並且建構一套性別關係的秩序。如該校整體的校園空間意涵就是一個男性的校園：空間的設計謹守工作場域與生活場域的分際，校園口筆直的道路直通工作場域，六個教學及行政大館全在一個圓環周圍，方便工作的效率；而學生宿舍及餐廳則在步行十分鐘外的另一個建築物集中地，此兩場域中間則是運動場；巨大的校園只有一個出入口，充滿父權式的監控機制。校園道路的設計筆直，沒有風雅的羊腸小徑或隱密庭園設計，反映理性思維掛帥；各建築中幾乎全無可供學生討論及聊天的公共空間或飲食部，代表著決策者與設計者忽視人際溝通場域的重要性。而不像其它學校各館有其名稱代表紀念意涵，該校各館皆以數字命名，代表簡單務實的價值觀（空間圖詳見附錄）。

此外，我們也需要注意到建築形式反映的性別象徵，如建築物的高聳及巨大圓柱設計，經常被解釋為一種追求卓越支配的陽具崇拜心態；設計做為人文社會學院的建築則採巨大凹形設計，這就是父權的地景（landscape）。即透過父權意識形態，具有獨特的性別場所精神的人為場景被創造出來，故我們需要思考空間的階層體系，如何造成性別不平等的設計，並思考擁有權力的人如何創造一個世界的秩序及

建構正當性。

在父權意識形態底下，校園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也產生均質化（homogeneity）的邏輯。廁所問題是最常被提起的，男女廁所的規劃只考慮到坪數的一致，而很少對生理上的差異進行細緻的考量。<sup>10</sup> 由此可知，大學校園中的空間是父權意識形態所宰制的社會結構化身，這樣的結構往往排除女性的使用經驗、漠視女性的需求，再生產性別不平等的空間。<sup>11</sup> 換句話說，空間或是建築作為意識形態，其組成不僅是一些零散的營建知識元素、設計的觀念，同時也包括整個象徵化的過程、社會迷思體系的轉化等等。

宿舍是另一個顯性校園空間的例子，Foucault（1978）曾指出，十八世紀寄宿學校的宿舍設計就是一種性論述：隔間和窗簾的陳設、睡眠時間的控制等，都代表對兒童的性控制。雖然這樣的論點不見得適合於當代，我們的田野中卻反映出相同的經驗：

學校在女生宿舍不夠時，把男生宿舍的某一部份挪出來給女生住，它[學校]就是用鐵門把他隔起來，等於就把那個地方跟男生隔起來。然後我們只能從另一個小門出來……那感覺好像監獄喔。（受訪者 11 與 15，女）

這樣的宿舍氛圍，類似 E. Goffman（1963）所謂的全控機構

---

10 對於新女廁運動的過程及女廁的問題，《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三期中有詳盡地討論（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1996）。

11 形成延伸意義的構成，相當於一個檢查制度（censorship）的建立（Baudrillard, 1996: 66）。檢查制度意指一項心理作用，使潛意識中的慾望只能用偽裝形式在意識中出現。

(total institution)，像監獄、精神病院、軍隊、修道院、住宿學校等等，其特質包括：生活在同一地，受同樣單一的權威所指導，很相似地被對待、需要在一起做同樣的事情。活動的順序或成果由一套明確正式的規定系統及負責監督的職員體系所掌控，隔絕於外面的世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換句話說，種種的典禮活動與儀式的本身就構成了一套隱藏課程。雖然男女生宿舍的區隔與禁止往往是基於安全的理由，但行動自由受到剝削的往往是女性，因此女學生住進宿舍後反而必須接受一套美名為「保護」的身體控制機制。但學校也會設計一些機制，以避免性別隔離後的抗拒形式出現，透過特定節日的設計（如麵包節）使得對宿舍的隔離及好奇，可以疏解；男學生也常藉由為女性服務的名義（如：修電腦）得以自由進入女生宿舍，瓦解宿舍的全面監控：

麵包節就是男女宿開放，進去的人只要帶一個麵包、蛋糕或派進去，我覺得這是學校刻意要經營一個節慶，因為男女宿舍平時不開放，不太有機會去看一個女生的房間。（受訪者 19，男）

我覺得這個活動跟其他學校的西瓜節、蘋果節是一樣的，促進兩性之間的交流，所送的麵包不同也有不同涵義，像是白吐司代表純友誼啊，太陽餅是永遠的微笑，有點像是花語那樣子。（受訪者 7，女）

運動空間是被視為最具有性別障礙的校園空間，男性受訪者總是習慣性地認為女性不擅長運動在於其天生性別氣質，而非他們佔據了運動的空間：

如果是平常球場使用上，真的是男生用的機率會比較大，女生可能就比較沒有空間運動。我覺得有一部份的原因可能是女生不太愛運動。（受訪者 4，男）

其實這不能說女生少使用，因為是女生自己也很少去運動，這是重點。（受訪者 13，男）

籃球場嗎？一般看好像都是男生的。這可以聯想到體育課一群女生就蹲在那邊聊天，男生就猛打籃球。……老師會知道啊，但是他就會覺得說女生就是這樣，好像就會覺得說女生就是這樣，不想運動，懶惰想偷懶，那就讓她們這樣子好了。（受訪者 8，女）

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父權意識形態下很典型的回應方式，畢恆達等人（1999）針對台大空間進行的研究中也看到同樣研究結果。對此，許多受訪者反思運動空間長期受到男性佔據之現象，並且提出可行性的抗拒策略：

我覺得有必要規劃一個地方，完全是女生優先，就是那個地方只有女生就是優先打球，除非女生沒有在那邊的話，男生才可以進去打。因為今天有可能是結構關係，不是說女生她不想運動，可能是我想運動、想打籃球，可是那個場是男生在用，可能要去喊也不好意思啊，整個結構會影響到個人的行動。（受訪者 12，男）

像據我所知其他學校，他們都有類似設立一個就是「女士優先」的球場，但是我們學校沒有，女生想要得到一個球場來打個羽毛球或打個籃球，基本上機會還蠻渺小的。我覺得說基本上我們學校是一個球場算很少的學校，既然如此，更應該做一個讓女生在運動方面比較能夠平等的機會，否則先搶先贏，那男生怎麼會搶輸女生呢？（受訪者 17，女）

女生比較喜歡打打羽毛球、打打排球阿，可是羽毛球場、排球場跟籃球場通常是三個設在一起的……，變成都是男生在打籃球，女生就沒辦法去去打羽毛球或是打排球，變成完全都是男生的「籃球場」，女生在球場上就是一個弱勢者。（受訪者 16，女）

因此，Gorely 等人（2003）強調需要發展性別相關（gender-relevant）的體育課，並且認為打破慣性才是最重要的方式。他們也指出女性在運動這個議題上陷入雙重的盲點，如果女性順從她們的女性特質的話，她們不是一點也不喜歡運動就是她們總是進行傳統上認為女性的運動。另外一方面，如果她們所進行的運動是傳統上被視為男性運動的話，這些喜歡激烈運動的女性，她們的女性特質往往受到很大的危機，她們的性傾向常被懷疑。不過，在我們看來，受訪者所提出的女士優先球場正是性弱勢對校園公共空間的爭奪與抗拒之例。抗拒的正面意義是許多過去被壓抑或忽視的聲音出現了，他們各自有其空間，其空間經常被編碼為 Foucault（1986）所稱的「異質空間」。<sup>12</sup> 這是介於真實與虛構空間之間與之外，它們確實存在，是一種對立基地（counter-site），但也是一種有效發動的虛構空間，在其

中一切文化的其他真實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立與倒轉。

## 五、結語：邁向性別敏感的校園場所精神

透過主體、語言與空間三個向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校園中性別化與去性別化的宰制與抗拒的現象。雖然表面上學校的許多制度與設計是性別平等的，但卻彰顯了某些主宰政策及空間者思考的慣性，如同 McLaren（1998）指出學校教育的本身是一種文化政治學的形式。學校透過日常實施的特定規範、期待與行為等，以引導、預備並合法化有權力者的社會生活形式，再生產不公平和性別歧視。按照 Bourdieu（1977）的觀點來看，慣性是環境所生產出來的持久的、可傳遞的秉性體系；經由長期累積，已內化的行為模式與思考方式，可以不斷地重複與持久存在於個體中，同時以無意識的方式指揮著個體的行動。因此，如果說教育的規劃者都是帶著過往的學習歷程與慣性來倡導性別平權的校園，那憑什麼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告訴學生體認到性別不平等的事實呢？因為學校真正有決策能力的高層本身就是帶有一種性別不平等的慣性思維。而校園內所受到的各式壓迫以致產生的沉默文化，事實上也是一種慣性使然，個人慣性的形成是在集體的歷史中被教導而成的，包括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認知（Bourdieu, 1977: 76-78）。

---

12 此外，bell hooks 重新組合了表徵的生活空間，作為潛在地滋養抵抗的場所，這是面對一切形式之壓迫的鬥爭的真實想像、物質與隱喻的交會場所。她選擇邊緣性（marginality）作為基進開放空間的特殊方式。邊緣性一方面可以視為基進的抵抗方式（radical resistance），另外一方面也顯現出階層區分的事實。hooks（1994）提到作為弱勢者的好處，就是可以讓她們同時瞭解權力者與弱勢者的觀點，可以體察兩邊不同的世界。

因此，校園中有形與無形的空間都可被視為一種性別的政治體制。雖然許多的左派論述倡導集體的抗拒，但同時也不應忽略個性化抗拒的重要性，因為權力既是個別化的、在地化的，所以抗拒自然也是個別化的、在地化的。畢竟人們經常面對的是在地的、立即的權力關係，抗拒也從這些最接近他們和立即的權力批評開始。我們要如何從性別化邁向去性別化？目前許多女性主義者已經強調賦予權能（empowerment）的重要性，對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學者來說，賦予權能意味著個體的賦予權能，但是對批判或是基進的學者來說，需要把賦予權能的概念置入社會與政治的脈絡。如 Giroux 與 McLaren（1986: 229）定義賦予權能為一種過程，學生可以獲得工具去批判外在他們經驗的囤積知識，目的在於擴展對他們自己、世界的理解，並且作為轉化我們生活方式中視為理所當然的各項假定之可能性。我們的立場是採取基進的角度，認為賦予權能就像 hooks（1993）所說的是一種持續實踐的形式（a form of ongoing prax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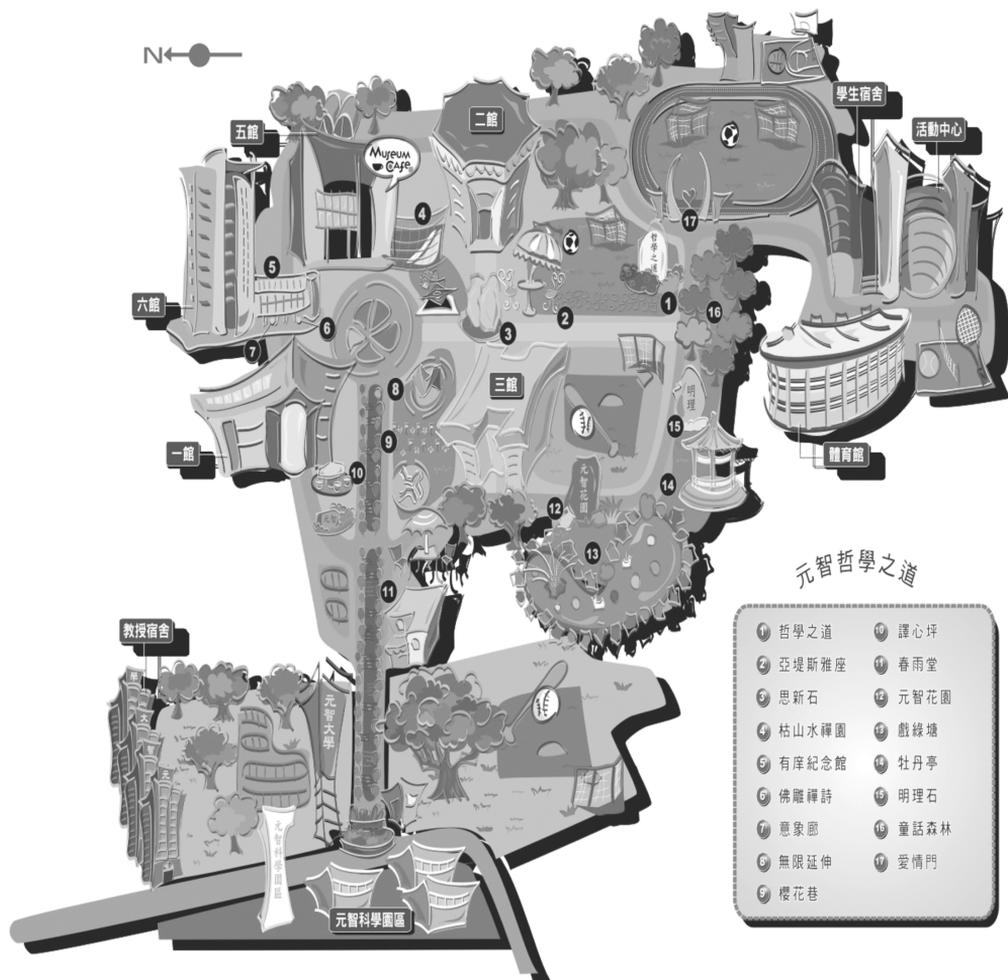
其次，我們認為一個真正性別平等的校園必然包含了性少數對性壓抑的抗拒。換言之，除了讓越來越多的人體驗及認識到校園性別結構對我們身體的規訓，以及如何運用單一或是正常的情欲模式來維持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還必須要招喚出性少數的認同，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性弱勢，反抗壓抑。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避免陷入 N. Alloway（1997）所謂的「競爭受害者症候群」（the competing victims syndrome）的陷阱，因為如果單以性別作為基礎的分析往往會掩蓋性別類別之內的差異。因此，千萬不要把主體位置的多樣性僅僅化約到性別角色的範疇，而需要考慮到混雜性（hybridity）的重要性。

為了具體打造具備性別平權意識的校園空間，我們認為需建構更具性別敏感度的空間，首要的工作便是瞭解校園中不同性別的成員所

體認到的需求差異。在需求預估上，教師、職員、學生可能有不同的體認，也因為不同的觀點建構出校園中不同性別經驗的面貌。固然批判教育學或是女性主義教育學強調一方面批判壓迫的秩序，另一方面也勾勒出可能的解放的秩序，但是請注意沒有絕對的解放，我們必須要說明的是性別校園的建構乃是一種局部的改變，而不是一種全盤的革命計畫，就像 Karl Popper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所提出的局部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莊文瑞、李英明譯，1989，Popper, 1966）。

最後，以科技主導、理工為主的大學校園，確實呈現出更清晰的男性思維慣性與父權式的監控，但是否同樣代表抗拒性別權力行使的困難？作者在該校兩性平等委員會及全校教師集會發表研究報告，以男性為首的決策群並無嘻笑否定的態度，詳細討論具體可行方法後，將所有建議列管，並令相關單位限期改善。誠如本文主題中反駁性別權力主宰的必然性，認為任何權力的宰制一定有反向的機制。在陽剛的科技型大學中，也許因為文化的慣性使父權思維先據，但重視科學理性思維的訓練也可能加速文化慣性的瓦解，理性思維也許可以增加性別公平對話的可能性。

## 附錄 元智大學校園空間圖



### 元智哲學之道

- |         |         |
|---------|---------|
| 1 哲學之道  | 14 譚心坪  |
| 2 亞堤斯雅座 | 15 春雨堂  |
| 3 思新石   | 16 元智花園 |
| 4 枯山水禪園 | 17 戲綠塘  |
| 5 有庠紀念館 | 18 牡丹亭  |
| 6 佛羅神詩  | 19 明理石  |
| 7 意象廊   | 20 童話森林 |
| 8 無限延伸  | 21 愛情門  |
| 9 櫻花巷   |         |

◎作者簡介

陳芬苓，英國巴斯大學社會政策博士，現為元智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教授課程包括性別社會學、性別／市場與國家專題、社會研究法等；研究興趣有全球化婦女政策、社會政策之性別分析、勞動力市場之婦女健康議題、以及大專校園之性別議題等。近年專注於研究聯合國及歐盟婦女政策，並與東南亞社會政策學者進行跨國比較研究。

〈聯絡方式〉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 135 號 元智大學社會學系

電話：(03) 463-8800 轉 2163

E-mail: flchen@saturn.yzu.edu.tw

張盈瑩，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博士候選人，元智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教授課程為性別教育；研究興趣有同志議題、教育社會學、台灣教育體制議題等。

## 參考文獻

- 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1996)〈廁所專題〉，《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3:1-113。
- 江麗莉 (1994)〈我國坊間幼稚園教材中兩性社會角色之評析〉，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
- 李元貞 (1993)《體檢國小教科書——主題體檢：兩性觀》。台北：台灣教授協會。
- 宋文里譯 (2001)《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觀點》。台北：遠流。
- 何春蕤 (1998)《性／別校園》。台北：元尊。
- 莊文瑞、李英明譯 (1989)《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台北：桂冠。譯自 Karl R. Popper (1966)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陳芬苓 (2003)〈兩性平等教育在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研究〉，《實踐通識論叢》，1: 63-80。
- 陳芬苓 (2004)〈科技的空間？性別的空間？教育的空間？——以一所理工大學為例談兩性平等教育方向〉，《通識研究集刊》，6: 175-203。
- 張喬婷 (1999)〈異質空間 v.s. 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 (1994)〈建築研究所的教育現象〉，《建築師》，20 (7): 105-127。
- 畢恆達等 (1999)《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指標》，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報告。
- 黃政傑 (1988)〈生活與倫理課本教些什麼〉，收錄於黃政傑編《教育理想的追求》。台北：師大書苑。

- 楊幸真 (2003) 〈女性主義教育學與女性主義教室：再思權力與權威〉，《教育研究月刊》，109: 125-136。
- 歐用生 (1985) 〈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形態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12: 91-125。
- 潘慧玲 (1998) 〈檢視教育中的性別議題〉，《教育研究集刊》，41: 1-15。
- 潘慧玲 (1999) 〈教育學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女性主義教育學初探〉，發表於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教育科學：國際化或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 魏惠娟 (1994) 〈國中國文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之分析〉，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
- 謝小芬 (1995) 〈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收錄於劉毓秀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83-218)。台北：時報。
- 謝小芬、王雅各 (2000) 〈經驗、發聲與性別政治——通識教育中的女性主義教學〉，《通識教育季刊》，7(2, 3): 47-76。
- 甯應斌、何春蕙 (2000) 〈邁向多元文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教育就是性教育，性教育就是教育〉，收錄於何春蕙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373-398。台北：麥田。
- Alloway, N. (1997) Boys and literacy: Lessons from Australia. *Gender & education*, 9(1): 45-49.
- Apple, M. (1990)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2000)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Bakhtin,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96) *The system of objects*. New York: Verso.
- Berger, P. & Luckmann, T. (1966)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 14-25.
-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Cambridge: Polity.
-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astells, M. (1992)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f The New Urba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 Connell, R.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 Diller, A., Houston, B., Morgan, K. P. and Ayim, M. (1996) *The gender question in education: Theory, pedagogy and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 (1978)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1): 22-27.
- Foucault, M. (1988a) 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 In L. H. Martin, H. Gutman and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y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pp. 145-162).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Foucault, M. (1988b) 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 In L. H. Martin, H. Gutman and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y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pp. 16-49).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Gero, J. (1985) Social-politics and the woman-at-home ide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50: 342-350.
- Giroux, H. A. (1983a) Theories of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3): 257-293.
- Giroux, H. A. (1983b)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 Giroux, H. A. and McLaren, P. (1986)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The case for democratic school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3): 213-238.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Y: Prentice-Hall.
- Gorely, T., Holroyd, R. and Kirk, D. (2003) Masculinity, the habitu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owards a gender-relevant physical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4): 429-448.
-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qualit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hooks, b.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MA: South Ends Press.
- hooks, b. (1993) bell hooks speaking about Paulo Freire: The man, his work. In P. McLaren and P. Leonard (Eds.), *Paulo Freire: A critical encounter* (pp. 146-154). New York: Routledge.

- hooks, b. (1994) *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New York: Routledge.
- Houston, B. (1985) Gender freedom and the subtleties of sexism education. *Education theory*, 35(4): 359-370.
- Klein, S. S. (1985) *Handbook for achieving sex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Mac an Ghail, M. (1991) Schooling, sexuality and male power: Towards an emancipatory curriculum. *Gender & education*, 3(3): 291-309.
- Mayberry, M. (1999) Reproductive and resistant pedagogies: The comparative role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eminist pedagogy in science education. In M. Mayberry and E. C. Rose (Eds.), *Meeting the challenge: Innovative feminist pedagogies in action* (pp. 1-22). New York: Routledge.
- Maher, F. A. & Tetreault, M. K. T. (1994) *The feminist classroom*. NY: Basic Books.
- McLaren, P. (1998) *Life in schools: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 McIlwee, J. S. & Robinson, J. G. (1992) *Women in engineering: Gender, power, and workplace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orphyrios, D. (1985) On critical history. In J. Ockman et al., *Architecture/criticism/ideology* (pp. 16-21). Princet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ubin, G. (1992)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H. Abelove, M. A. Barale and D. M. Halperin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s* (pp. 3-44). New York: Routledge.

- Scott, J.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dgwick, E. K. (1993)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erwsbury, C. (1987) What is feminist pedagogy?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15(3-4): 6-14.
- Shotter, J. (1989)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You'. In J. Shotter and K.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pp. 133-151). London: Sage.
- Shweder, R. A. (1990) 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In J. W. Stigler, R. A. Shweder and G. Herdt (Eds.), *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a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pp. 1-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nso, K. L. (2001) Plotting something dastardly: Hiding a gender curriculum in engineering. In E. Margolis (Ed.),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55-174). New York: Routledge.
- Tyler, S. (1978) *The said and unsaid: Mind, meaning and cultur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jcman, J.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Cambridge: Polity.
- Willis, P.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 Chris Bark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A Gender/Sexual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Space in a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Fen-Ling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Yuan Ze University

*Ying-Kwun Chang*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While Taiwan's scholar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of gender and education have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primarily on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their main research sites, analytical research projects concerned with higher education remain quite sparse. Thus, in an attempt to fill in the existing gap,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mechanisms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operate with regards to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context. We limit our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a case study of an engineering college that has recently upgraded its status to that of a privat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By analyzing relevant ethnographic studies, we forward the premise that gender and sexual biases in the setting of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ave grown quite obvious.

What fo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s result in the existing phenomena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By applying Michael Foucault's notion of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relevant discourses from the field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feminist pedagogy, we analyze the three spatial concepts-subject, language/

interaction, and space—in regards to education, to discuss how strategies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operate on each of these levels. While focusing on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ith a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 we carry ou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proposed by feminist pedagogy which suggest that schools should be viewed as transformative sites where tactics of countering hegemonic power are being born. Finally, this study maintains that bodily regulations and power relations existing in gender and sexual structures in education must be exposed, in order to allow a full transformation of one’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o take place.

**Keywords:** domination/resistance, power, cultural psychology, feminist pedagogy